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研究*

檀学文

摘要: 本文研究了中国情境中的人民福祉概念,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人民福祉与国际人类福祉理论的异同以及人民福祉理论如何在福祉测量上体现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人类进步和解放的理论,其中蕴含着科学的福祉观。人民福祉是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具体化,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类发展程度的表征,其具体内涵为:全体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社会关系改善的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健全发展程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福祉基本原理以及人民福祉与国际人类福祉比较,本文提出了一套由人类福祉和福祉社会条件两个账户组成的人民福祉测量方案。

关键词: 人民福祉 人类福祉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福祉测量

中图分类号: F061.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二十大则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由此可见,增进人民福祉已经被认同为改革与发展的目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福祉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它是否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以及历史阶段性特征?如果有,这对它自身的应用会产生什么影响?以上就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问题。一个关联性问题是,国际上已有较为成熟的福祉理论及测量方案,还有必要另外提出一套新的福祉理论吗?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不足,但是具有迈向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内核。社会主义人民福祉在总体上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人类福祉,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可以恰当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福祉内涵。

除引言外,本文从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进行探索。第二部分归纳人民福祉概念的形成和演进路径,表明其具有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目标的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阐述马克思主义福祉观,界定马克思主义人类福祉的概念内涵和特征。接下来,第四部分以马克思主义福祉观作为理论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总体不发达的基本特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创新工程研究类项目“面向2035年中国反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编号:2021NFA02)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征，从理论上界定人民福祉概念，并描述其基本特征。第五部分采取比较方法，归纳梳理国际福祉理论，对人民福祉理论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比较性回答，揭示它们的联系与区别。第六部分在前述理论建构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双账户人民福祉测量方案。这一测量方案既能够体现已有的福祉测量成果，也可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福祉的特点。最后，笔者从五个方面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发现，得出了三个方面的初步结论，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人民福祉概念的形成和演进

人民福祉概念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其演变存在实践和理论两条路径：在实践上，人民福祉概念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思想和国家治理实践的结晶；在理论上，人民福祉概念既受到国际上相关研究的影响，又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的理论总结。

（一）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形成和演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人民福祉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在前期的人民利益、生活富裕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其内涵也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福祉一词自古有之^①。孙中山先生可能是汉语语境下提出现代意义上人民福祉概念的第一人^②。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政党奋斗目标的做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存在一条从人民利益到人民福祉的演进轨迹。最早也是最经常出现的相关概念是人民利益。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曾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有类似表述，即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人民利益并行发展起来并大量使用的概念是生活富裕或共同富裕。1953年，毛泽东在推动农业合作化时，就指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③。1983年，邓小平在研究现代化方案和目标时，提出了“三个有助于”标准，其中之一便是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正式提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展望，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幸福生活、造福人民、幸福安康等概念也在不同场合加以使用。

福祉概念首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出现，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2010年底和2011年初，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在公开场合使用了增进人民福祉、为了

^①古代汉语中，先有祉福、祉禄，后有禄祉、福祉等词汇。《诗经》中《烈文》一诗写道：“烈文辟公，锡兹祉福。”

^②1905年，孙中山发表《同盟会宣言》，提出“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5/29/t20070529_11531669.shtml。

人民的福祉的表述^①。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视为时代的任务。如本文开头所述，真正将增进人民福祉视为发展使命和目的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可见，从1997年到2013年，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为人民谋利益转变为增进人民福祉，这说明党的初心使命的内涵不断明确、日益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其内涵或本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中国梦”的三大内涵是对既往论述的新概括，代表着对国家使命的最新认识。根据“中国梦”的内涵以及以往的相关论述，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命概括为实现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福祉。一方面，国家富强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宏观目标，包含民族振兴、生产发展、绿色发展等次级目标。另一方面，人民幸福、共同富裕等近义术语可以用更具客观性、实践性且包含人的发展含义的增进人民福祉概念来表达。

几十年来，人民福祉及相关概念的内涵日趋丰富，这一概念曾经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物质生活方面的生活水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生活富裕，偏主观感受的生活幸福，以及偏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界定。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用“七个期盼”表达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些表述视为在实践中不断演进的人民福祉内涵。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常常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或者增进民生福祉并列表述。

（二）在理论研究中的演进

人民福祉概念的实践演进过程也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③。在可查的中文文献中，关于人民福祉的学术论述最早出现于2007年。这一年，丁元竹相继发表两篇文章，认为中央高度关注民生、促进科学发展的做法实质上是将增进人民福祉确立为发展目标，当时时兴起来的对生活品质的评价也就是对人民福祉的评价（丁元竹，2007a；2007b）。这两项研究比官方表述早了三年多，其形成过程包含两条逻辑线索：一方面是国外福祉和生活质量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国内提出科学发展观及社会政策变化的启发。2009年，有研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人的福祉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由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成为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和标准（刘丹，2009）。一年以后，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一篇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④。2012年，一篇硕士论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福祉问题（郭坤，2012），其内容包括现实背景、理论依据、内涵和评价

^①参见：胡锦涛，2011：《共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人民日报》1月1日，第1版；温家宝，2011：《在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日，第1版。

^②资料来源：《周文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梦思想概述》，<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506/c40531-24978998-4.html>。

^③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以后较少见到以人民福祉为对象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国内也形成了一批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感、生活质量、福祉指数研究，也包括与本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研究。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赘述。

^④资料来源：新华社特约评论员，2010：《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新华每日电讯》10月23日第1版。

标准、影响因素、道路选择等，颇具前瞻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学者指出，促进公平正义是一项紧迫任务，其实质便是增进人民福祉（田学斌，2014）。从理论和实践交织演进的顺序看，可以合理地认为关于人民福祉的理论阐述对该概念进入党和国家的施政理念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使得关于人民福祉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人类福祉观

如果要福祉理论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必然首先要考察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所从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和上升阶段，该理论旗帜鲜明地将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社会更替的最终目的，蕴含着深刻的、科学的人类福祉观，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福祉概念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福祉的概念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体系，这既是它的理论主题，也是它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实现，而推动社会更替的目的就在于全人类解放，包括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自身解放，使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做自己的主人，并成为自身的主人^①。“三个解放”和“三个主人”代表了人类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过多描述其所追求的人类发展目标具体是什么，也没有明确使用过福祉概念，因此需要寻找相关的理论线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有对个人自由发展的理解。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②。阿马蒂亚·森经常引用这段话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个人自由发展与福祉关系的理解（Sen, 1985）。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记录，如赤贫、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无限贫困和有限贫困等，这些贫困现象均可视为福祉缺失，是人类解放的对立面^③。本文认为，可以尝试从这两个方面归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的福祉概念。

人类福祉的基本含义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好的程度（森，2008；Crisp, 2017）。这是一个通用定义，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以及各种具体福祉理论。在用什么来定义和表征人类福祉方面，形成了很多理论流派，这里仅提及其中三种代表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享乐主义，该理论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人们的主观感受，因而可以将这种主观感受视为主观主义福祉。由于快乐与痛苦是不同的事物，享乐主义实际上是在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之间追求审慎的平衡。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第368页、第370页、第375页、第3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第70页、第3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例如，边沁提出，“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边沁，2000）第二种类型是经济福利或经济福祉。基于享乐主义的功利主义思想提倡人类行动的原则是追求最大化的快乐或幸福，随后发展起来的福利经济学利用功利主义原理分析人类经济行为的目的，但其研究对象被限制为可测度的经济福利（庇古，2010）。经济福利本来只是人类福利的一部分，但是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被“滥用”为效用或福利的全部（汪毅霖，2013）。第三种类型主张用人类发展或生活质量表征福祉（UNDP, 1990; Stiglitz et al., 2009）。英语中的“life”一词兼具生活和生命双重含义，这两层含义实际上都是生活质量的应有之义。对照以上三种关于福祉内涵的理论流派，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可以将人类解放和发展程度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人类福祉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地，则可以将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界定为共产主义福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福祉^①。

在政治哲学层面，人类解放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摆脱了自然界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奴役和束缚，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唯一目的，才有真正的发展和福祉可言。这意味着，在达到最高福祉之前，马克思主义福祉的提升在本质上是不断积累条件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而，根据“三个解放”原理，马克思主义福祉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发展的三个方面。其一，物质生活条件，即不断积累物质生活条件，摆脱贫困、疾病和不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使其达到适度水平，消除人自身发展的物质约束。其二，社会关系，即逐步消除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社会运行机制流畅，社会关系公平和谐，从而消除人自身发展的社会约束。其三，人自身的发展，即既要不断推动个人的身心健全发展，又要使身心潜能自身限度内得到充分实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自身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福祉的核心内涵，其最高目标是达到没有外界约束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状态；物质生活条件是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最终目的；社会关系在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不仅是促进或限制人自身发展的外在条件，还与人自身的发展相辅相成（见表1）。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前两个方面的条件已经实现，那时的人类将集中精力追求没有止境的最高福祉。

表1 马克思主义福祉的维度和具体内涵

福祉维度	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关系	人自身的发展
维度内涵	摆脱贫困、疾病、生产力落后的困扰，提供适度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	消除压迫和剥削，社会运行机制流畅，社会关系和谐	人类身心健全发展，潜能充分应用
维度联系	实现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	实现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人自身的发展相辅相成	马克思主义福祉的核心内涵，最高目标是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福祉的理论基础

在初始概念构建中，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定义参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有关理论。这一方

^① “他（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迫使人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面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人类福祉理论之间建立逻辑通道，另一方面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福祉的研究建立概念基础。本文的分析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福祉观的根本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福祉观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将会在曲折中前进和上升。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的。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和压迫，然而生产力落后，社会关系虽然和谐但并不丰富，“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②，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自由度都是极为初级的。阶级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是发展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导致了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把异化理解为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的、客观的人类存在状态。所谓异化，是指人和自己的创造物的关系的颠倒和错乱，人本身的发展“不是表现为活动的目的而是表现为实现获得物这一目的的手段”（王金福和王永山，200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促进了人的发展。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能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还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③。但是，一方面，以私有制为本质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发展在总体上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异化的。另一方面，这种异化又特别体现为阶级差别和社会差距的扩大，即无产阶级相对于有产阶级、低收入人群相对于高收入人群无法实现充分发展^④。据此，马克思主义得出科学论断，只有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积累生产力高度发展、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条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才会从根本上消除，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⑤。照此推断，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用物质生活水平以及体力、智力发展和运用的程度等衡量人类福祉水平都是必要的。一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以物质生活水平为基础的福祉评价可能也将像经济发展评价一样失去其必要性。

（三）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福祉就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而言，具有实现主义、全民性、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社会实践性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 实现主义福祉。马克思主义视人类为类存在物，人类通过生产活动形成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由于其自觉能动性，人类必然不断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并不断改变自身，从而形成对各种善的认识和追求。其中，将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整体的善作为共同追求，体现着人自身生存的意义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87页。

^⑤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9页。

价值，即本文意义上的福祉。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属性，福祉首先必然是一种实现主义的福祉，即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幸福生活及其潜能和价值能最大化实现，使人在各个方面全面且充分地发展。实现主义还意味着，人民福祉必然是一种实质福祉，而不是主观享乐主义或欲望满足意义上的福祉。实质福祉要建立在充分的物质条件之上，但不是对物质生活的无限追求。实现主义福祉并不否认主观享乐、欲望满足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是否定它们在根本意义上对人类福祉的代表性。

2.全民福祉。越来越多的福祉或幸福理论都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主体性，这相对于只研究抽象的精神追求的宗教思想以及经济运行的福利经济学而言是巨大的理论和社会进步。但是，无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思想中的“以民为本”，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它们一方面均具有承认人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无一例外地只是关注到部分阶级和阶层的实际利益，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将尊重普通人利益原则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胡钧和施九青，2016）。或者说，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进步的人本主义思想遭遇了与政治和经济实践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论依据是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意味着它从根本上保证其所追求的是所有人的福祉而不是部分人的福祉。在生产水平总体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不断提升总体福祉水平，也要提升底层人群的实质福祉水平以缩小福祉差距。

3.历史性和阶段性。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生产力进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最终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两个社会形态之间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阶段。人民福祉由生产力水平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共同决定，因此其总体水平和分布特征也将与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更替，人民福祉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这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制度更新的必然结果，人民福祉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仍具有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福祉水平尽管也会逐步提高，但是无法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下应有的水平。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根源得以消除，但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制度不完善，人民福祉水平往往还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缩小发展差距成为其首要任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剥削和异化劳动的生产力根源及制度根源均得到根本性消除，人类将从整体上具备追求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福祉评价也将失去其意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福祉理论实际上主要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其评价内容也应当有所不同。

4.社会实践性。历史上，关于福祉或幸福的理论或思想通常由思想家或学者提出，他们多少都会与当政者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的甚至是当政者的敌对者，因而进步思想难以转化为施政理念。中国历史中的仁政和民本思想看上去是利民的，但是“予之为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和统治阶级利益。《尚书》中说“上天以五福助人”，表明“五福”来自上天所赐而不是个人劳动的结果，尽管这并不否认历史上也存在统治阶级施行仁政、利国利民的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共产党以及其所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公然主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幸福就是其政党宗旨以及进行革命和建立政权的目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革命目标和执政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

四、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理论

人民福祉是国际主流话语中的人类福祉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福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因而可将其称为社会主义人民福祉。这意味着对人民福祉的理解不仅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基本原理，更要突出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独特国情，还要与主流的人类福祉理论有恰当的契合。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实现主义以及全民性特征都应当在社会主义人民福祉中得到体现，因此与西方福祉理论存在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尤其应当在社会主义人民福祉中加以体现和应用。不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会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当今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越南和老挝都认为其目前尚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①。本文虽然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背景^②，但总体不够发达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有特征^③，这是理解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基础。

（一）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内涵界定

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基本内涵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程度，其核心是人自身的发展，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其最高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社会不发达，大部分人远不能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水平，全体人民在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上的束缚还比较大。尽管如此，中国已经在作为其行动指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形成了增进人民福祉的政策理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福祉观以及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本文将人民福祉界定为社会主义不发达条件下的人类发展程度，其基本内涵包括全体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社会关系改善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健全发展程度。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内涵对应于“三个解放”的实现程度和马克思主义福祉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但其内容更具有阶段性特点，更符合当前社会实际。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总体偏低，与人们的合理需要相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仍是发展的主旋律。其次，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剥削的根本约束，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不完善，这意味着仍然存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及阶层间的不平等关系，人的发展仍面临社会关系层面的约束。再次，人自身的发展更突出地体现为促进人的身心健全发展，不断为更长远的人类发展目标积累条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身心健全发展着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身心健康，主要是消除身体以及精神疾病和羸弱；二是能力素养提升，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提倡的精神文明

^①资料来源：《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https://my.wust.edu.cn/2022/1026/c2119a269664/page.htm>；坎曼·占塔琅西，2018：《老挝人民革命党确立老挝迈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32-35页。

^②中国在2020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尽管如此，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③本文假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除了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别外，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本质区别。

建设^①，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②。

由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关系改善程度远未达到消除束缚的程度，所以人民福祉的前两个方面不仅是第三个方面的条件和手段，而且也是重要的、并行的目的和目标。

（二）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主要特征

由马克思主义福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社会主义人民福祉具有如下三方面的主要特征。

1. 人民福祉改善程度相对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从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发展指数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福祉改善程度相对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以中国为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全体人民参与经济生活，根据阶段特征实施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0年，中国和世界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501和0.598，中国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10年，这两个指数分别提高为0.702和0.697，中国实现了对世界平均水平的超越，这种超越比人均GDP的超越早11年^③。而到了2021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68，比世界平均水平高0.036^④。中国居民的福祉改善除了体现为平均福祉水平的持续提高外，还具有鲜明的逐步跨越门槛的特征。尤其是，中国逐步实现了消除制度性压迫、免受外敌侵犯威胁、解决温饱问题、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基础性民生福祉的门槛跨越，保护的都是底层人群的福祉，是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全民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体现。

2.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但保障程度尚不充分。社会主义社会为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了短期和长期的制度保障，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福祉的社会实践性。就中国而言，这些基本制度保障主要包括：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中国实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虽然不属于基本制度范畴，但由于得到长期坚持，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制度特征。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设计被认为是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内生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短期内可能无法为人民福祉提供足够充分的保障。此外，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尚不成熟，一定程度的经济行为异化现象依然存在，例如经济利益从发展手段变为最高目的，社会关系被当作资本而过度市场化等。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变革和完善是进一步保障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必然要求。

3. 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民福祉的全面发展，但不充分不平衡仍是其基本特征。中国所追求的小康社会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全面小康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就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求是》1996年第21期，第5-16页。

^②本文对身心健全发展的定义，可以视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以及中国关于精神文明的定义的一种结合。笔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虽然全面，但存在过于宽泛的缺陷，而且存在不易准确翻译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complete well-being”在正式文件中被翻译为“完全健康状态”，在中文语境中就有同义反复的嫌疑。

^③2021年，中国和世界的人均GDP分别为1.26万美元和1.23万美元，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④人类发展指数数据来自于UNDP网站，<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indicies/HDI>。

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感等多个维度。社会主义中国在治理实践中追求人民福祉的全面发展，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①。尽管如此，现阶段人民福祉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既不充分也不平衡。例如，2021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虽然已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全球排序中仅为第79名。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水平的一半左右，相当于最发达国家门槛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②。受此影响，中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每人每天13.82美元，低于所处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序列15.02美元的平均消费水平，只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水平的29.61%^③。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福祉还呈现出维度间、群体间的不平衡特征。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在缩小国民教育和健康差距上做得较好，但是在缩小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社会保护等的差距方面则相对进展缓慢。人群之间的福祉差距体现在收入、教育、生活水平、财富以及精神文明等多个方面。少数高收入个体已经具备了追求自我实现的条件，但还有相当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仍然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和基础性福祉。

五、国际福祉理论的比较借鉴

既然定义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福祉，就难免要将其与现有的福祉理论进行比较。国际上的福祉理论非常繁杂，尚不存在公认的“主流”福祉理论。这部分首先简要梳理国际上已有的福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与人民福祉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福祉理论的简要梳理

国际上的人类福祉理论基本以哲学（伦理学）为起点。关于幸福和福祉的最早论述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以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主义福祉理论为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2009），该理论深刻影响了当代福祉理论（UNDP，1990）。针对“对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这个基本问题，福祉理论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享乐主义或主观福祉理论、欲望实现或偏好满足理论、客观列表理论（Parfit，1984；Dolan et al.，2011；Crisp，2017）。从这个分类看，可将社会主义人民福祉视为客观列表理论。福祉列表的内容总体上不以个人偏好为转移，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性特征。在客观列表理论框架下，根据福祉维度设置以及指标选择依据产生了诸多理论，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六类（麦克格力高，2014）。按照内涵理解、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可将这些列表式福祉理论重新归纳为四类。

一是人类发展理论。该理论以阿马蒂亚·森的行为能力理论为基础，认为人类发展是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指选择范围的扩大，也指实际获得的福祉水平的提升，最关键的三个方面是健康长寿、受教育和体面生活（UNDP，1990）。在行为能力视野下，人类选择范围的扩大即代表福祉能力的提升和福祉自由，可以说，人类发展即福祉（森，2008）。人类发展理论最突出的应用表现在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2021：《中国的全面小康》，《人民日报》9月29日第10版。

^②数据来源：张永军，2021：《应如何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21世纪经济报道》1月12日第04版。

^③数据来源于魏后凯和杜志雄（2022）。

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上，这一指数指标简洁，可比性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适用。

二是生活质量理论。生活质量的类型非常广泛，既有客观生活质量，也有主观生活质量或主观福祉。这个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其要义是认为生活质量所涉及各维度都有内在价值，难以相互替代或者排列优先序。在《萨科齐委员会报告》中，主观福祉被当作生活质量列表的一部分（Stiglitz et al., 2009）。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如OECD的“更好生活指数”、英国的国民福祉指数^①。多数生活质量理论并不过多强调理论根源，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归纳，强调物质生活水平 and 生活方式。主观福祉则包括生活评估、情感感受等方面内容。

三是替代性福祉理论。在一些极富地域特色、传统文化突出的地区形成了基于生活质量理论但又对其有所超越的替代性福祉理论，它更强调文化、精神性等非经济因素。例如，不丹的“国民总幸福”（GNH）被认为是一种整体发展观和替代性发展理论，其对幸福的理解侧重强调心理福祉（Ura et al., 2012）。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理论被认为是对西方发展理论的替代，它更强调个人生活与社区、自然的整体和谐（Gudynas, 2011）。相比而言，西方主流福祉理论建立在高水平增长和消费的基础上，而替代性理论则反对对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痴迷。

四是社会福祉理论。伴随人类福祉理论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福祉理论（Sharpe, 1999）。社会福祉评估社会层面的发展进步水平，代表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条件。例如，在列格坦繁荣指数（LPI）中，真实繁荣被定义为所有人都有成长机会，这一指数将繁荣指标设置为包容性社会、开放经济和赋能的人类三个领域（Legatum Institute, 2021）。社会进步指数（SPI）致力于评价确保人类福祉的社会条件，包括基本需要的满足、福祉基础和发展机会等^②。与此同时，在一些评价人类福祉的理论中也包含支撑人类福祉的社会要素，例如：澳大利亚福祉指数包括个人指数和社会指数，不丹国民总幸福指数的9个领域对应于经济社会的四大支柱。

综合地看，人类发展理论可称为一般性福祉理论；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福祉理论由于多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故可称为西方主流福祉理论；替代性福祉理论则是相对于西方主流福祉理论而言的。

（二）国际福祉理论对人民福祉理论的启示借鉴

对福祉理论进行直接比较很困难，比较本身也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针对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做出比较性的回答，为更好地认识乃至完善人民福祉理论提供参考和借鉴。

1.对福祉内涵的理解有何异同？在测量转化中如何体现？当前国际理论中对福祉内涵的理解相当多元化，表明福祉理论仍处于发展之中。主流的人类发展理论很大程度上传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现主义福祉理论，将人类发展定义为选择自由和选择能力扩展，主张通过自愿选择实现最终福祉（UNDP, 1990）。还有一些研究将人类发展界定为蓬勃人生和充分实现个人潜力。这些理论都着眼于人自身的发展，认为人类发展即福祉，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定义相当接近。也有不少西方福祉理论仅从测

^①更好生活指数可参见：<https://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111111111111>；国民福祉指数可参见：<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wellbeing>。

^②社会进步指数可参见：<https://www.socialprogress.org/global-index-2022-methodology>。

量角度给福祉作出了基于现实生活的定义，有的甚至回避定义问题。界定福祉内涵的主要作用是测量提供依据。尽管福祉测量已取得很大进展，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从各个方面对人类发展（福祉）成就进行了测量，也有一些研究尝试从主观角度测量实现主义福祉，但是如果坚持人类发展的本源涵义是实现主义福祉的观点，那么便应当认识到，实现主义福祉最终应当回归到在客观层面的测量。此外，还要注意人民福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因此，对人类发展的深层次内涵继续进行概念化和指标化探索将是国内外福祉研究的共同任务。

2.如何看待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福祉的基础。对于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在人类福祉中的地位，人民福祉理论与西方主流福祉理论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有以经济增长为保障的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人民福祉理论甚至还要求达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便对人的发展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这一点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但是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并非完全一致，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具有动态性特征，即在较低起点上的较快增长并缩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在增长的同时还要避免消费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替代性福祉理论，这类理论不要求甚至反对高度的物质文明，认为要“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3.如何处理能力与福祉的关系？当前西方主要的福祉理论几乎都以行为能力方法为基础。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将人类发展或福祉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形成行为能力，二是运用行为能力并产生福祉结果。福祉理论将行为能力视为可以选择的可能性，并对只将人体内的能力要素视为工具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批判（UNDP，1990）。但是在实证研究中，行为能力仍然主要是指健康与教育，生产、消费或闲暇则都被视为结果，这表明行为能力理论与实证分析之间仍然存在距离。能力和结果的区分在概念上是清楚的，但在具体的福祉测量方案中对二者的处理方式则不尽相同。有时教育和健康被视为与其他指标并列的福祉结果，有时教育、健康和其他因素又一起代表福祉条件。这与人民福祉理论将教育和健康视为身心发展的一部分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别。

4.主观福祉应在人类福祉中扮演什么角色？近年来国际上发展出丰富的主观福祉理论，总的来说包括评价性福祉、体验性福祉和实现主义福祉（Dolan et al., 2011; Hicks et al., 2013）。评价性福祉与体验性福祉主要关注居民当下的心理状况，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实现主义福祉则用来反映人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自我评价。主观福祉在西方福祉理论中不可或缺，它有时被用来代表人类福祉，有时被视为生活质量列表中的一部分。与之相比，人民福祉理论侧重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则重视不足。中国一直提倡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在国家治理中强调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实践经验都应当在福祉理论中加以体现。实现主义福祉在本质上属于客观福祉，尽管它可以部分地采用主观评价形式，但不能完全以主观方式评价。因此，人民福祉理论既要完善主观福祉，也要解决实现主义福祉的测量问题。

5.如何体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人类社会仍存在不平等的阶级或阶层关系、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政策，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福祉是各类福祉理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但不同理论重点关注的维度以及对维度内涵的认识差别较大。西方主流生活质量理论不直接涉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关系方面仅限于社会情感联系和社会资本范畴。社会福祉理论既关注社会层面的福祉条件，也

关注经济、政治制度层面的福祉条件，这一点在列格坦繁荣指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指数强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促进经济繁荣（麦克格力高，2014；Legatum Institute，2021）。替代性福祉理论的认识则反差很大，例如，“良好生活”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真正的重要性，社会制度不应以经济增长为中心（Chuji et al.，2019）。可见，虽然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因素在国际福祉理论中已有大量讨论，但要将其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福祉框架中还需要做大量工作。社会主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被视为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但在当前又存在诸多有待改革完善之处。因此，人民福祉理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面临如何处理与国际福祉理论的兼容与冲突问题。

六、人民福祉测量的建议方案

以国际福祉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新的福祉理论，目的之一在于改进福祉测量方案以便更好地评价社会进步和促进社会实践。福祉测量是指在福祉理论上，用可操作、可计量的福祉指标恰当地体现福祉水平，其结果可用于福祉评价。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理论，并与西方福祉理论进行了比较。以上理论工作需要福祉测量中有所体现才能显现其理论价值。福祉测量本身是一个相当大的议题，是当前福祉研究的主体内容，受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展开充分讨论。这部分主要根据逻辑推论，阐述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理论内涵对福祉测量的启示作用。

（一）国内福祉测量的简要回顾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居民福祉或社会进步的测量和评价方面国内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统计监测、地方政府施政评价和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在统计监测方面，一个代表性成果是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印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该监测方案设计了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6个维度的23项指标^①。以该监测方案为基础，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曾经发布过几次监测报告，但随后不了了之。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国家采取了白皮书形式予以定性说明而未采用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去定量描述^②。在地方政府施政评价方面，一个代表性成果是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2005年开始创建，包括客观指标体系和主观指标体系两部分，其中客观指标分为好工作、好收入、好环境、好心情和好身体5个方面，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基本对应，主要用于评价社会环境和政策效果（朱民阳，2011）。2008年和2011年，江阴市先后发布两轮建设幸福江阴行动纲要，随后则较少发布。在学术研究方面，代表性福祉测量成果有清华大学的“中国民生指数”、山东大学的“输出型福祉指数”、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生发展指数”等^③。简要地说，这些测量指数多数侧重客观福祉，有的测量的则是社会福祉。有的指数使用了满意度指标，但这个指标主要是与客观指标相对应的。笔者所在课题组尝试构建中国农民福祉指

^①资料来源：《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http://www.stats.gov.cn/ztc/ztfx/fxbg/201112/t20111219_16151.html。

^②资料来源：《中国的全面小康》，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8/content_5639778.htm。

^③前两项可参考吴国宝等（2014）；后一项可参考历年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逐年出版。

数，其中不仅使用了 10 个维度的客观指标以及相应的满意度指标，也使用了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生活意义 3 个主观指标（吴国宝等，2014）。这些福祉指数存在的共性问题包括：较多采用直接引进和简单应用的“拿来主义”方式，受数据和投入成本方面的限制导致持续性不强，对具体国情的反映和结合不足。因此，到目前为止，虽然人民福祉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学术研究和统计监测层面的人民福祉测量仍然强差人意。

（二）人民福祉理论对福祉测量的基本启示

现代意义上的福祉理论和福祉测量是从西方社会起步的，即便是富有盛名的不丹国民总幸福指数也离不开西方学术团队的大力支持，因此在中国开展福祉测量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做到以我为主，批判借鉴，符合国情社情。本文构建的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理论，以及对它与西方主流福祉理论所作的比较，可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福祉测量提供如下基本启示：

第一，从与国际主流福祉内涵的一致性方面看，人民福祉测量应当具备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方面，人民福祉测量要同西方主流福祉测量一样，以居民为中心，同时测量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在主要福祉维度上可保持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人类福祉的实现需要必要的社会条件保障，所以既要测量人类福祉自身，也要测量有利于增进福祉的社会条件。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在国际福祉理论中，对人类福祉自身的测量和对增进福祉的社会条件的测量基本是分开的，社会福祉中虽然包含人类福祉的要素，但是既不全面也不直接。人民福祉理论强调制度特色和优势以及国家对人民福祉的保障作用，所以对人民福祉的测量应当同时测量人类福祉自身及其社会条件。

第二，基于人民福祉与西方主流福祉的区别，测量人民福祉时应尽可能体现包含在社会主义信念中的规范性要求、社会制度的区别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从本文第五部分所列举的各种区别可以看出，这些差异体现在基本社会制度对福祉的保障作用、对收入和消费等物质福祉的数量与质量平衡的追求、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差异、对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程度等方面。

（三）社会主义人民福祉测量的建议方案

基于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对西方主流福祉测量方案的参考，人民福祉测量方案可考虑设置人类福祉和福祉社会条件两个账户。为体现人类发展的基本内涵，人民福祉中的人类福祉可划分为生活水平、社会关系、主观福祉和身心健全发展四个领域，这些领域各自又包含若干维度。福祉社会条件是指增进人类福祉所需的各类社会条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领域（见表 2）。

表 2 社会主义人民福祉测量建议方案

人类福祉		福祉社会条件	
领域	维度	领域	维度
生活水平	生活消费水平、文化生活质量、住房条件、时间利用、自然条件及环境安全	政治条件	政治领导力和政治稳定、人民民主
社会关系	经济公平、政治参与、社会联系、社区安全	经济条件	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
主观福祉	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社会条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普惠的社会保护体系、社会稳定与安全

表2 (续)

身心健康发展	身体和心理健康、受教育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治观念、意义与目的、成就或价值感、自我实现感	环境条件	生态环境保护
--------	---	------	--------

注：作者根据 Stiglitz et al. (2009)、Ura et al. (2012)、吴国宝等 (2014) 和 Legatum Institute (2021) 的研究得出。

本文所建议的社会主义人民福祉测量方案主要遵循以下依据提出：

第一，参考 GNH 指数设置 4 个支柱以及 LPI 指数专注于福祉条件的做法，分设人类福祉和福祉社会条件两个账户，这样可以同时体现人类福祉发展水平和保障福祉的社会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支撑条件，对前者的需要是改革与发展后者的依据。

第二，与多数福祉指数只将福祉诸维度划分为客观福祉与主观福祉两类不同，本文按照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三方面内涵，将福祉诸维度划分为四个领域，分别为生活水平、社会关系、主观福祉和身心健康发展，后者即人自身的发展。虽然前两个领域的结合相当于西方理论中的客观福祉，后两个领域的结合相当于西方理论中的主观福祉，但是本文的划分方法突出了社会关系与人自身发展的特有属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福祉的特征。

第三，对人类福祉的各类维度选择，综合参考了《斯蒂格里茨委员会报告》、OECD 更好生活指数以及中国农民福祉指数中的维度设置方案。受篇幅限制，本文无法逐一讨论具体维度的选择及其内涵。实际上人类福祉的各个维度及其内涵的确还存在很多需要明辨的地方，例如：如何体现消费水平的适度性和消费内容的合理性，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居民经济公平方面的优越性，如何评价获得感，如何更好地体现个人发展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等。

第四，关于福祉社会条件的设置，本文主要参照 LPI 指数和 GNH 指数，将影响人类发展福祉的社会条件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四类，这四类条件各自又包含一个或多个维度。由于这里参考的两个指数对社会条件或福祉支柱的理解反差很大，本文在此仅是初步借鉴。人民福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非直接作为社会条件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影响政治领导力、经济增长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安全稳定等“中介性”社会指标而间接发挥作用。

七、总结和讨论

本文讨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是什么”“人民福祉理论与西方福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人民福祉理论对福祉测量的启示”这三个问题。由这些问题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能否直接将西方成熟的主流福祉理论应用于中国。本文采取演绎和比较的思路回答上述问题。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人民福祉是对特定社会条件下人类福祉的表达，与一般的人类福祉具有共通性，但是最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福祉原理中寻找根本依据。沿着这样的分析思路，首先，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构造了马克思主义福祉观，推论出不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福祉的概念内涵，即“三个解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和实现程度，进而阐明了人民福祉的主要特征。其次，本文比较了人民福祉理论与国际人类福祉理论的联系和区别，澄清了人民福祉所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最后，

立足于人民福祉的独特内涵对其测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构建了双账户的人民福祉测量方案，这一测量方案与过去简单引入国外福祉测量理论相比具有理论进步意义。不过，国际上的人类福祉及其测量理论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其自身范围内取得了相当成熟和显著的成效。本文不是为了推翻、否定西方福祉理论，而是通过论证人民福祉与西方人类福祉的区别更好地理解基于特定社会背景的福祉内涵及其测量方法。

（一）研究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蕴含着科学的人类福祉观。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在于实现人类解放，其最终目标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类“三个解放”和“三个主人”的实现程度，可以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福祉的基本内涵。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福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福祉的核心内涵，物质条件是其必要条件，社会关系不仅是重要的外在地条件，还与每个人的发展相辅相成。

第二，可以从总体不发达条件下的人类发展程度定义社会主义人民福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界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和目标，另一方面则通过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所以马克思主义福祉评价实际上涵盖的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说，需要从不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出发理解“三个解放”的实现程度，具体是指全体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社会关系的改善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健全发展程度，同时也要考虑现实生活中的主观福祉。在不发达阶段，人民福祉的前两个方面不仅是第三方面的条件，也是与其并列的目的和目标。

第三，人民福祉与西方主流福祉都具有规范性特征，都同时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和增进福祉的社会条件，这使得二者具有进行理论对话的基础。西方福祉理论起初也采取价值中立的形式，如使用收入、主观幸福感等指标。后来出现的列表式福祉理论表明，使用哪些因素衡量福祉水平是有规范性依据的，不完全由个人自身决定。与此不谋而合，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决定的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内涵与维度选择也具有内在规范性。一方面，事关日常生活的各种客观和主观福祉维度代表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实现主义福祉越来越多地在国际福祉理论中得到重视，同时也是人民福祉的内在要求。

第四，人民福祉与西方主流福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其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发展。人民福祉与西方福祉理论的区别在人类发展的三个方面（参见表1）均有体现，其中最根本区别在于人民福祉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发展，而人自身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论所在。在社会主义阶段谈论所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时尚早，以促进身心健全发展为目标可能更为合适，这样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处于正确的发展轨道。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解放”，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促进深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第五，人民福祉测量可以结合马克思主义福祉观和西方主流福祉测量的优点，采取双账户方案。本文梳理了西方主流福祉理论，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单一且公认的主流理论福祉。通过比较，笔者认为，完整的福祉理论应同时包括人类福祉和福祉社会条件两方面内容。在西方理论中，福祉社会条件往往以单独的福祉理论形式呈现。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特别强调自身制度优势对人民福祉的保障作用，所以有必要同时监测福祉的社会条件，并在福祉的社会条件与人类福祉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本文

认为，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测量可包括人类发展福祉和福祉社会条件两个账户。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有“三个解放”的明确认知，所以人类发展福祉可以采用与“三个解放”对应的福祉领域。从各领域的维度配置看，这样的分类法不仅具有理论自洽性，而且与西方福祉测量理论没有内在矛盾。

（二）研究启示

第一，人民福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民福祉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因此从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角度界定社会主义人民福祉的科学内涵是可行的。这样既能探索与西方福祉理论的一致性部分，又能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既有利于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也有利于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更紧密的一致性。

第二，人民福祉研究构成当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一部分。继续深入研究人民福祉的理论基础、科学内涵以及测量评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上述判断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增进人民福祉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理念和目标，从学理上探索人民福祉理论有利于国家政策更好地契合人民利益；其次，人民福祉理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但是之前的研究对此不够重视，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当代化进程中深入挖掘人民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最后，人民福祉理论与西方福祉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澄清。

第三，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社会人民福祉的不平衡不充分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尽管人民福祉水平得到快速显著改善，但是当前仍具备不充分、不平衡的基本特征，社会关系约束仍是限制人民福祉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作用，通过更好的测量手段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此同时，也要承认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不完善，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导向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三）研究展望

多数福祉理论都立足于具体社会情境并在研究中嵌入了制度、文化等因素，所以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福祉的探索在研究路径上是可行的。本文研究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福祉，从马克思主义福祉观出发，结合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界定了人民福祉的内涵，并通过与西方主流福祉理论比较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双账户人民福祉测量方案。毫无疑问，本文的研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也需要相关的实证研究。如下四个方面可以是进一步研究的优先领域：第一，人类福祉背后的支撑性理论的兼容性，如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理论与阿马蒂亚·森的人类发展及福祉理论的有机联系；第二，如何界定和评价不发达阶段人自身的发展，包括如何将精神文明、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嵌入对人自身的发展的评价，如何将人自身的发展与健康、教育、能力等因素进行整合，如何从主观评价转向客观评价等；第三，如何评价社会制度因素对社会关系改善的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制度改革的影响；第四，重大战略、重大政策的福祉影响评价。

参考文献

- 1.边沁, 2000: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时殷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57 页。
- 2.庇古, 2010: 《福利经济学》(上卷), 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16 页。
- 3.丁元竹, 2007a: 《从关注民生到确立以人民福祉为发展目标》, 《中国发展观察》第 6 期, 第 17-18 页。
- 4.丁元竹, 2007b: 《从 GDP 到人民福祉——关于构筑以生活品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群言》第 7 期, 第 19-23 页。
- 5.郭坤, 2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福祉问题研究》,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6.胡钧、施九青, 2016: 《论“以人为本”、人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与战略》第 11 期, 第 1-5 页。
- 7.刘丹, 2009: 《科学发展与人民福祉》, 《学习月刊》第 5 期上半月, 第 9-10 页。
- 8.麦克格力高, 2014: 《人类福祉测量的国际行动回顾》, 载吴国宝、李静、檀学文(编)《福祉测量: 理论与方法与实践》, 北京: 东方出版社, 第 13-28 页。
- 9.森, 2008: 《能力与福祉》, 载森、努斯鲍姆(编)《生活质量》,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35-61 页。
- 10.田学斌, 2014: 《促进社会公正 增进人民福祉》, 《光明日报》6 月 25 日 01 版。
- 11.汪毅霖, 2013: 《基于能力方法的福利经济学——一个超越功利主义的研究纲领》,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 47 页。
- 12.王金福、王永山, 2005: 《从异化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对人的存在状态发展之路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第 5-10 页。
- 13.魏后凯、杜志雄, 2022: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 202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 27 页。
- 14.吴国宝、李静、檀学文, 2014: 《福祉测量: 理论、方法与实践》, 北京: 东方出版社, 第 66-73 页。
- 15.亚里士多德, 2009: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302-311 页。
- 16.朱民阳, 2011: 《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 《行政管理改革》第 3 期, 第 75-78 页。
- 17.Chuji, M., G. Rengifo, and E. Gudynas, 2019, “Buen Vivir”, in Kothari, A., A. Salleh, A. Escobar, F. Demaria, and A. Acosta (eds.), *Pluriverse: A Post-Development Dictionary*, New Delhi: Tulika Books, 111-114.
- 18.Crisp, R., 2017, “Well-Being”,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17 Edition),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17/entries/well-being/>.
- 19.Dolan, P., R. Layard, and R. Metcalfe, 2011,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Measures”, <https://eprints.lse.ac.uk/35420/1/measuring-subjective-wellbeing-for-public-policy.pdf>.
- 20.Gudynas, E., 2011, “Buen Vivir: Today’s Tomorrow”, *Development*, 54(4): 441-447.
- 21.Hicks, S., L. Tinkler, and P. Allin, 2013,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Potential Role in Policy: Perspectives from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Social Indication Research*, 114(1): 73-86.
- 22.Legatum Institute, 2021, “The 2021 Prosperity Index Report”, The Legatum Institute Foundation, https://www.prosperity.com/download_file/view_inline/4429.
- 23.Parfit, D.,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92-299.
- 24.Sen, A., 1985,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2(4): 169-221.

25. Sharpe, A., 1999, "A Survey of Indicator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http://www.csls.ca/reports/paper3a.pdf>.
26. Stiglitz J. E., A. Sen and J. P. Fitoussi,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miqols.org/howb/wp-content/uploads/2016/06/Stiglitz-Well-Being-Report-rapport_anglais.pdf.
27. UNDP,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11, 21.
28. Ura, K., S. Alkire, T. Zangmo, and K. Wangdi, 2012,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GNH Index*, Thimphu: The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9-10, 123-13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马太超)

A Study on the People's Well-being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TAN Xuew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otion of people's well-being in China's context and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does people's well-being mean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well-being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well-being theories? How are the theories of people's well-being reflect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well-being? Marxist theory is a theory about human progress and liberation, which contains scientific views on human well-being. People's well-being is the embodiment of Marxist well-being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gree of hum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under-developed socialism. Specifically, people's well-being means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ving standards of all residents, the degree of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eople's well-being and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theorie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a set of people's well-being measurement scheme consisting of an accou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an account of social conditions for well-being.

Key words: People's Well-being; Human Well-being; Marxism; Socialism; Well-being Measurement